

旅游指南与城市形象

——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研究

罗桂林¹, 王敏²

(1. 南昌大学 历史系, 南昌 330031; 2. 南昌大学 图书馆, 南昌 330031)

[摘要] 旅游指南在中国近代大量出现, 以概要介绍城市景观为主要内容, 以普通游客为主要读者。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还通过对景观有意地选择、放大和排列, 建构出新的城市形象。从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可以看到, 这种脱胎于传统地方史志的文献, 其写作目的已不再是营造士大夫共享的“雅趣”, 而是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 重新定义地方的“代表性”景观, 重构城市形象, 它成了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的工具。

[关键词] 近代; 福州; 旅游指南; 城市形象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3.01.014

[中图分类号] K92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3)01-0043-06

一、引言

中国近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新式交通渐趋发达, 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旅游活动开始兴起。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 各式“旅游指南”开始大量出现, 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地区, 旅游指南的编写成为一种风气。城市指南由于登载了丰富的信息, 日渐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例如, 林星利用《福州要览》、《最新福州指南》等资料, 分析福州近代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1]。冯贤亮、林涓以民国江南城市导游指南为资料, 分析城市公共管理、经济产业、休闲生活、马路景观、交通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 指出城市指南如实地反映了江南城市生活的“现代化”进程^[2]。

城市指南“呈现”出何种城市风貌中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城市指南以何种方式“呈现”出这一风貌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因此, 使用城市指南时, 除了应注意其“史料”价值以外, 还应重视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方面, 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如, 邵勤在研究近代南通出版事业时, 就注意到张謇等人有意借助出版宣传, 塑造南通在地方自治事业上成功的形象, 南通因此被视为“近代中国第一城”^[3]。吕绍理使用地图、照片、旅游手册等资料, 讨论日治时期台湾旅游活动的“制度化”过程, 指出旅游手册等出版物为制度化的旅游活动勾勒出了旅游空间, 塑造了一种台湾地理人文景观的固定形象, 成为台湾人认知自身和定义台湾的主要内容^[4]。这些研究注重探讨文本在文化传承与权力建构中的作用, 深化了我们的认识。

本文以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为主要资料, 分析

其与传统的地方史志之间的差别, 考察近代以来地方精英在编撰城市指南的过程中, 如何重新定义地方的“代表性”景观和重塑城市形象, 探讨这一新的城市形象如何经由现代出版行销机制而得以强化。希望通过这一个案分析, 深化对中国近代城市转型和文化变迁的理解。

二、从文人读物到旅游指南

福州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 一直是中外人士的“旅游目的地”, 为了满足旅客迅速熟悉福州的需要, 很早就出现了介绍当地简况的著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连续出现了数部福州的旅行指南。如福州人郑拔驾——曾于1929年被聘为福州西湖公园董事会的干事主任——在其任上为了给游览西湖公园的游客提供方便, 曾编成《新西湖》一书, 详细介绍了西湖的过去、西湖公园的建设与管理、西湖公园的未来^[5]。郑拔驾又于1934年编成《福州旅行指南》, “俾游览者得以按图索骥”, 以期“他省人士前往游览者”更形踊跃^[6]。此外, 福州人郑宗楷等人, 在担任省会公安局警察养成所教职期间, “为了要便利旅闽的认识我们和不认识我们的同胞”, 编写过《最新福州指南》, “公开发售”^[7]。此后, 郑宗楷等又将该书修订为《福州便览》, 希望“而今而后, 倘为事实所许, 必不惜时努力, 年刊一回, 充实内容, 达到本书理想的境地”^[8]。

旅游指南这类读物看似新近出现, 但若略加回顾, 则可发现自有其历史渊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路程指南和日用类书, 与旅游指南在某些方面实有共通之处。福州明清时期的地方史志, 与此也有

[投稿日期] 2012-12-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 LS1009); 江西省社科“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编号: 11LS16)

[作者简介] 罗桂林(1977—), 男, 福建永安人, 讲师, 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城市史。

重要的内在联系。从现存资料看,至少从明代开始,由福州文人创作的地方史志已大量出现。如明代王应山编撰的《闽大记》、《闽都记》,徐燠、王世懋、陈鸣鹤、谢肇淛等人也留有《榕阴新检》、《闽部疏》、《东越之苑》、《五杂俎》等,内容十分丰富。到清代,此类由文人编撰的以介绍乡土情况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更多,如《闽中摭闻》、《榕城景物略》、《榕郡名胜辑要》、《竹间十日话》、《榕城考古略》、《榕城要纂》等^[9]。近代的旅游指南对地方历史沿革与乡土掌故介绍得似乎更加详细,但与传统地方史志之间的内在传承性却是非常明显的。

总的来看,传统地方史志的目标读者是士大夫,其撰述目的或者是在士大夫间共享某种“雅趣”,或者是宣扬士大夫的道德使命。因此,传统的地方史志本质上是一种文人读物。而近代出现的旅游指南,其编写目的是便利游客熟悉当地情势,侧重于介绍当地的“代表性”风景名胜。旅游指南的目标读者不再限于士大夫,而是各种旅客。郑拔驾在编写《新西湖》时,曾指明其目的是使“一般市民,或命弓车,或掉孤舟,各携一册,按图而索,或更足引起游西湖的兴趣”^[10]。郑拔驾编写的另一部著作《福州旅行指南》,也明言其写作目的是便利旅闽游客,使之“得以‘按图索骥’”,解决“方言隔阂,交通欠便”等困难,使“读者因阅是篇而起游兴”^[11]。再如在福建省会警察局任职的郑宗楷等人,也指出其编写《最新福州指南》的目的,也是鉴于“福州还没有关于指南针这类的出版物”,“为了要便利旅闽的认识我们和不认识我们的同胞,遂将这个小小不完全不成样子的书,拿出一部分,公开发售”^[12]。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的丘国珍,在为《福州便览》作序时也指出,该书“对于福州现势调查颇为翔实”,不仅“可作为一部历史或地理看”,也“可作为一部文化经济之发达史看”外,更重要的是,该书“亦可至指点迷途,便利旅客,尤其不无者”^[13]。

由于旅游指南的目标读者不再是士大夫,而是那些具备一定阅读能力的普通民众,因此旅游指南不再以营造士大夫间共享的“雅趣”为目的,而更强调向普通民众宣扬灌输某种“正确的”、“现代的”政治观念,塑造某种“理想的”城市形象。在《最新福州指南》封面之后收录了多幅照片,其中半数是福州的“代表性”名胜,如鼓岭全景、洪山桥、金山塔、南公园、白塔、石塔、西禅寺等;另有约半数插图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意义,如有几幅照片分别展示了福建省政府、绥靖公署、福建省省会公安

局、警察养成所警士教练所等政府机关,还有一幅照片是福建省省会公安局局长丘兆琛的半身肖像。此书的封面背页,还登载了当时最具政治意味的“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这些名胜图片和政治性图片有意地穿插在一起,使那些对图片感兴趣的读者(大多数读者对图片都很感兴趣)在领略福州名胜的同时,也直观地感受到了在福州的“党治”政治的存在。

在《最新福州指南》的正文中,同样充斥着大量有意安排的政治内容。该书卷2《地方行政》罗列的“本市机关”,包括福建省省会公安局及其各分局队、福州市码头管理处、福州城台工务管理处、闽侯县政府、闽侯县公安局等10余个机构;该卷还罗列了各种有关本市的城市管理规则,如由福建省会公安局制定的《警察单行章程》,其中包括10余个管理规则^[14]。这些政府机关和管理规则在书中的详尽罗列,向读者展示了现代城市严格的管理制度的存在。这些详尽罗列的管理规则,提醒着读者必须按规则行事。旅游指南承载的这种“普法”功能,成为城市当局与地方精英行使权力的新渠道。

由此可见,近代旅游指南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地方史志的社会功能,它触及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成为传达“现代化”观念与建构政治权威的重要方式。

三、从“榕城八景”到近代公园

传统的地方史志与近代的旅游指南之间,除了有不同的目标读者群和具备各异的社会功能外,二者对城市空间的描述也有相当不同的侧重点。本节主要以传统地方史志中的“名胜”和近代旅游指南中的“公园”为分析对象,讨论二者在城市空间建构方面之侧重点的转变。

(一) 传统地方史志中的“榕城八景”

传统地方史志对福州城市景观的论述很多,在众多的笔记资料和地方史志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代表性”景观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关于福州传统城市游览空间的最常见的归纳,当属“榕城八景”了。榕城是福州的别称,“榕城八景”是对福州府城内外代表性景观的概括。据民初福州名士郭白阳《竹间续话》的记载,早在明末,就有“榕城八景”的说法,其时福州地方画家杨津、许友、关讯、林之蕃等人,曾将榕城八景绘成画册,由书法家齐中、王逸、林宠、黄潜等人题字。郭白阳曾在陈宝琛之子陈几士的家中亲见以《榕城八景》为名的画册:

陈几士丈家藏金石图册甚富,尝以《榕城

八景》一册相示，画者、书者皆明逸也。第一幅曰“澜阁风荷”，杨津画，陈騵书《郑焯西湖澄澜阁序》。第二幅曰“高盖擎云”，许友画，齐中题。第三幅曰“螺浦春潮”，卢葵画，林之蕃题。第四幅曰“榴洞仙踪”，吴讯画，王逸题。第五幅曰“鳌石松篁”，林宪书《方城宗子相登平远台序》，林之蕃画。第六幅曰“莲峰樵唱”，郑慰画，曹孟济题。第七幅曰“凤冈荔锦”，陈浩画，黄潜书《徐燧绦囊生传》。第八幅曰《众峰积雪》^[15]，杨津画，崔衍江书《徐燧雪峰记游》^[16]。

据分析，“榕城八景”之第一景“澜阁风荷”，指的是位于福州城西的西湖澄澜阁；第二景“高盖擎云”，指的是位于福州城南之南台高盖山；第三景“螺浦春潮”，位于福州南台岛的螺洲；第四景“榴洞仙踪”在福州东门的榴花洞；第五景“鳌石松篁”，则位于福州城内西南角的于山；第六景“莲峰樵唱”，指的是福州城北的北岭莲花峰；第七景“凤冈荔锦”，指的是闽江南岸的仓山凤岗里；第八景“众峰积雪”，指的是福州西北向的雪峰山^[17]。“榕城八景”以福州府城为中心，将府城及附近的自然景观与文人品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代表了士大夫游览空间的典型特点。

对士大夫而言，这些以“八景”、“十景”命名的景致之所以值得推崇，不仅在于它呈现出自然景观的优美，而且也在于其被赋予的各种人文价值，其所呈现的是自然景观与人文价值的结合。在这类倍受推崇的游览空间中，随处可见代表士大夫道德追求与价值取向的标的物。民国《西湖志》卷5《名胜》收录了多幅配图，包括《李忠定公祠图》、《萨侍郎祠图》、《宛在堂图》、《西湖书院图》、《西湖社图》等，这些配图表明“八景”不仅是士大夫欣赏山水景致之所在，而且也是其宣扬儒家价值和强化彼此认同的场所。《李忠定公祠图》描绘的祠宇位于西湖东南岸，奉祀福建人、宋代名臣李纲；该祠右转是被称为“桂斋”的祠宇，供奉着福州人、民族英雄林则徐^[18]。西湖中树立的这两座伟人祠宇，无声地宣扬着士大夫的忠义观念与道德使命。《萨侍郎祠图》描绘的祠宇则树立于西湖岸边的大梦山，崇祀福州历史上有名的孝子萨琅及其弟礼部侍郎萨琦。该祠“上有杰阁，以祀文昌”^[19]。这样，士大夫对孝道的主张和对科举的执着，通过萨侍郎祠和文昌阁的结合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此外，《宛在堂图》中的宛在堂，肇修于乾隆年间，“以祀乡先辈之能诗者”^[20]；《西湖社图》中的西湖社，也是以崇祀

“里中名流”，即“道光间为诗者黄鹄山人辈凡九人”为对象^[21]。祠宇中对士大夫前辈的崇祀，反映的却是士大夫对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同。

在这类作品的论述中，士大夫塑造了以“八景”、“十景”命名的游览空间，将山水景致与文人品味融合在一起，构造出某种精致的品味和悠远的意境，传达着士大夫共享的价值观，这当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深入了解与参与分享的。在这种游览空间中，士大夫与民众之间是明显地疏离的，这也使这类游览空间呈现出“曲高和寡”的一面。

（二）旅游指南中的“公园”

近代以来，随着旅游活动成为时尚，旅游制度逐渐确立，这使传统地方史志中展示的“八景”、“十景”等游览空间无法适应需要，一种新的游览空间——面向大众的“公园”开始出现。公园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调动起普通大众的极高热情。旅游指南恰兴起于此时，它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这种新兴的游览空间，将“公园”视为近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公园”的政治文化意义积极进行宣扬。游客在阅读城市指南了解“公园”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指南中关于“公园”的定义。下面将沿着城市指南的笔触，看它是如何定义“公园”的，读者在阅读这一文本时将接触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园”观。

福州最早开辟的公园是西湖公园。民国三年（1914），闽人沈瑜庆等以西湖水利长期失修，呈请巡按使许世英拨款浚湖，许世英随即任命林炳章等办理浚湖事宜。西湖修浚完成后，“就想藉人为力支配天然”，将西湖中的旧建筑重新改造，并增筑相关建筑，又重加铺设花木，辟为公园^[22]。至民国五年（1915），巡按使许世英又将原先的耿王庄重新加布置，辟为城南公园^[23]。与传统的“八景”、“十景”相比，以公园为代表的新式游览空间具有更强烈的实践意义。因此，在各式城市指南中，都特别强调公园在政治动员与现代启蒙中的重要意义。《新西湖》指出，“良好公园的建设”，“不仅为游览憩息之需，而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均有绝大关系”；“设备完全的公园，都应有体、德、智、美四育的设备”^[24]。《新西湖》作者指出，西湖公园在民国初年的开辟，就是当局顺应“自由”、“解放”的时代潮流的成果，因为西湖公园的开辟，“不特秀才可以出门，即千金小姐、奶奶太太，前日深闺自守，授受不亲，也可以比肩而行，密坐而语”^[25]。

《新西湖》不仅交代了西湖公园的建设缘由，还详细记载了西湖公园的政治文化追求。《新西湖》

提及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地方当局认为西湖公园不能以建设为“一个‘美’字便算完满”, 主张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增添关于智、体、德的设施”, 这样才能在“行见环湖数十里转瞬间便可尽入眼帘”的同时, 又能“实现孙总理在民生主义范围内所拟讲而未讲的‘育’、‘乐’地步”^[26]。时任西湖公园董事会干事主任的郑拔驾, 就此向西湖管理当局提出 28 条建议, 极力主张“增添关于智、体、德的设施”^[27]。这些建议强烈地主张对民众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 体现出现代化精英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眼里, 公园不是单纯的游览空间, 而是驯化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形塑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郑拔驾的意见得到西湖公园董事会的支持。董事会认为, “一个平原旷野或高山流水, 若加以人工的建筑和设施, 自更足增自然之美”, 但若“欲成一德、智、体、美四育完备的场合”, 则“自非加以人工不可”。随后董事会公布了改造计划, 其中树立总理铜像、建立中山纪念塔、中山纪念亭、中山纪念堂、遗嘱亭、总理遗训碑、党歌练习牌等措施的政治动员意味极强, 设立巡回文库、音乐亭、公共娱乐场、公共体育场、通俗动物园、模范男女厕所等措施则蕴含着极深的现代启蒙意味^[28]。城市指南《新西湖》展示的西湖公园, 不只是一种游览的空间, 而且还是现代化精英和地方当局驯化民众的重要场所。

旅游指南标示出福州城市游览空间的转变, 并将这种转变后的空间定义为城市的“标准化”形象。这种“标准化”的城市形象在现代的出版和行销手段支持下, 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四、城市形象的推广

旅游指南中构建起来的城市形象, 要从作者笔端传达到“读者阶级”的脑海, 尚需经过几个关键的环节。首先, 为了使这种城市形象受到“读者阶级”的欢迎, 作者必须确保阅读过程充满趣味性; 其次, 为了让读者接受书中的观点, 还须确保书中的观点具备权威性; 再次, 还须确保书籍行销便利, 使读者有机会阅读。

确保读者乐于阅读, 是城市指南首先着眼之处。与传统的地方史志不同, 旅游指南一般都配有大量的图片, 尤其是近代照相技术的引入, 使城市景观的保存变得更加方便和直观, 城市形象的展示也变得异常“客观”和有趣。《最新福州指南》封面之后附印的 6 页图片中, 共收录了 18 幅照片, 主要是风景照。《福州便览》的插图达 21 页之多, 也多是风

景照。《福州旅行指南》的照片更多, 如果算上封面插图的话, 一共有 26 页 27 幅。《新西湖》中的风景照也有 14 幅。对一般读者而言, 这些以风景照为主的“插图”充满了趣味性。这种刺激读者兴趣和迎合读者阅读习惯的编写策略, 推动了旅游指南成为时尚流行的读物。

为了增强旅游指南的权威性, “名人效应”的策略也被反复使用。福州近代各种旅游指南, 充斥着大量的名人题签和序记。1929 年编辑出版的《新西湖》之封面, 就是福州人、著名书法家郑孝胥的题签。1933 年编辑出版的《福州便览》, 其封面题签落款则为福州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

新的城市形象要在“读者阶级”中传播, 离不开现代出版行销手段的支持。经此, 新的城市形象得到强化, 旅游指南成了对城市形象的“标准化”解释。《新西湖》一书曾附有其出版印刷机构——华宝印刷公司的广告, 就明确地点出现代印刷机制的这种巨大能量:

君知道印刷的能力多大罢?

印刷, 是扩大革命的宣传器, 是一切文明的发动机, 是振兴实业的先锋者。

印刷事业, 在社会上是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试看: “农工商学兵”各界, 无不以印刷物品为必需品^[29]。

华宝印刷公司深知印刷巨大能量之发挥, 有赖于具体的印刷技术的改进, 尤其是“新机、铅字、特别纸墨”的引进:

本公司有见于斯, 抱定改进的决心, 对于以前所有的障碍, 详加研究。而亲赴各地采办新机、铅字、特别纸墨, 印就光彩夺目, 与别家不同。各界赐顾, 请临一试, 便知言的不谬啊!^[30]

近代福州与此类似的新式出版机构甚多。例如, 《福州便览》的出版机构——环球印书馆, 也曾在随书广告中宣称其印刷技术“与别家不同”的“五大特色”:

(一) 铅字新颖 最近添办多种, 字迹模糊者则废弃不用。

(二) 种类完全 各号英汉铅字应有尽有, 此外如新式标点、注音符号、英文字母、数理专门符号, 亦备有多种。

(三) 排配美术 备有新式眉画、奇巧花边等等, 以备制版者配制。

(四) 价值公道 本号系工友合组经营, 力求营业发达, 以少取多来为宗旨。

(五)定斯取件 本号对于取件日期,力求信实,打破普通商场兜揽愆期种种恶习^[31]。

此类新式出版机构努力引进新技术,适应了读者的阅读需要。环球印书馆“种类完全”的特色表明,该印书馆不仅有各种英、汉铅字,还有新式标点、注音符号、数理专门符号等,这不仅使作者的思想在书中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而且使读者的阅读过程趋于简便。例如,新式标点的引入,至少使普通读者的阅读过程省去了句读的麻烦。旅游指南成为流行读物,不仅与一般识字阶层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有关,也与印刷机构不断实现的技术革新密切联系。

为了让普通民众方便地获得旅游指南,通畅的图书行销渠道就显得相当重要。《新西湖》经由华宝印刷公司印刷完成后,该书立刻被寄售于福州各大书店。该书封后记载了寄售处有如下数处:

西湖公园各茶店
鼓楼前文明书局
南街塔巷口洛阳社书店
南街花巷口云林阁书店
南街黄巷口宏文阁书店
南街官巷口广百城书店
南街官巷口左海书店^[32]

《福州便览》经环球印书馆印刷后,也由分布于福州各处的各大书店分售:

福州上南路 商务印书馆
福州下南路 世界书局
福州下南路 万有图书社
福州台江路 云章行
福州台江路 南星旅社^[33]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和出版商为了使旅游指南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往往还与全国性的图书行销网络联系起来。《福州便览》除了由福州各大书店分售外,还在上海的英租界香宾旅馆设立有代售所^[34]。于是,善于福州的新形象,开始在全国推广。

为了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这些书籍,作者和出版发行商往往采取低价销售策略。例如,《新西湖》售价仅标为大洋2角;《福州便览》为了“使之普及于我读者阶级”,“特以折扣发售”,每本定价只有大洋8角^[35]。

五、小结

本文以福州为个案,透视中国近代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建构过程:旅游指南大量出现,不仅重

新定义了中国传统城市的“代表性”景观,而且塑造了现代城市的新形象。福州个案表明,传统士大夫编写的地方史志,将“榕城八景”视为福州的“代表性”景观,营造士大夫共享的雅趣,在其中赋予了独特的道德追求与社会责任。旅游指南在近代的兴起,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化精英对城市空间的重塑。在城市指南中,近代“公园”取代了传统的“八景”,城市“代表性”景观被重新定义,福州的城市形象被重新塑造,这种新形象又借助现代的出版行销手段而得到强化。

注释:

- [1]林星:《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福建城市现代化研究(1843-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396页。
- [2]冯贤亮、林涓:《江南城市的导游指南与生活变化(1912-194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 [3]邵勤:《出版事业和政治形象:1910-1920年的南通模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3期。
- [4]吕绍理:《日治时期台湾旅游活动与地理景象的建构》,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89-326页。
- [5]郑拔驾:《新西湖》,华宝印刷公司1929年版。
- [6]郑拔驾编:《福州旅行指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7]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最新福州指南》,1932年版。
- [8]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福州便览·初版序》,环球印书馆1933年版。
- [9]关于明清以来留存至今的福州地方史志的详细介绍,可参看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7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9页。
- [10]郑拔驾:《新西湖·卷头语》。
- [11]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序》。
- [12]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最新福州指南·初版序》。
- [13]丘国珍:《福州便览序》,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
- [14]包括《取缔交通规则》、《管理车夫规则》、《取缔戏院规则》、《取缔印刷业规则》、《管理浴场章程》、《取缔茶楼酒饭规则》、《取缔道路规则》、《公共汽车取缔规则》、《脚踏车使用及管理规则》,等等。
- [15]原文作“象峰积雪”,据何振岱《几士属题明人画闽中八景,存四首》(何振岱:《何振岱集·觉吾庐诗存》,刘建评、陈叔侗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作“众峰积雪”,疑“象峰”为“众(衆)峰”之误。据改。
- [16]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 [17]刘湘如:《建议评选榕城“新八景”》,载《福州晚报》

2002年9月10日。

- [18]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 [19]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61页。
- [20]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64页。
- [21]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77页。
- [22]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最新福州指南》卷6《园林及名胜古迹》,第1-2页。
- [23]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2页。
- [24]郑拔驾:《新西湖》,第8-10页。
- [25]郑拔驾:《新西湖》,第35页。
- [26]郑拔驾:《新西湖》,第47页。
- [27]郑拔驾:《新西湖》,第51-57页。
- [28]郑拔驾:《新西湖》,第57-60页。
- [29]《华宝印刷公司广告》,郑拔驾:《新西湖》。(该广告列于《新西湖》一书的封面、插图、《卷头语》之后,目录之前,共1页。)
- [30]《华宝印刷公司广告》,郑拔驾:《新西湖》。
- [31]《环球印书馆大刷新广告》,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第182页。
- [32]郑拔驾:《新西湖》,封面背面。
- [33]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封底。
- [34]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封底。
- [35]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福州便览·初版序》。
- [2]林星. 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福建城市现代化研究(1843-1949) [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 [3]邵勤, 出版事业和政治形象: 1910-1920年的南通模式[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4(3).
- [4]吕绍理. 日治时期台湾旅游活动与地理景象的建构[C]//黄克武主编. 画中有话: 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 [5]郑拔驾. 新西湖[M]. 福州: 华宝印刷公司, 1929.
- [6]郑拔驾. 福州旅行指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7]郑宗楷, 周子雄, 姚大锺. 最新福州指南[M]. 福州: 1932.
- [8]郑宗楷, 周子雄, 姚大锺. 福州便览[M]. 福州: 环球印书馆, 1933.
- [9]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州市志第7册[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9.
- [10]何振岱. 何振岱集·觉吾庐诗存[M]. 刘建评, 陈叔侗点校.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 [11]郭白阳. 竹间续话[M].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12]刘湘如. 建议评选榕城“新八景” [N]. 福州晚报, 2002-9-10.
- [13]何振岱. 西湖志[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1.
- [14] Rev.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5 (Reprinted in 1986 by Graham Brash Ltd. in Singapore).
- [15]台湾总督府外事部. 福州事情[M]. 台北: 台北印刷株式会社, 1941.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ravel guides and urban image ——Research on the travel guides in modern Fuzhou

LUO Gui-lin¹, WANG ming²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Nanchang University, Librar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travel guide, whose main content is an overview of the urban landscape, appeared popular in modern China. Its major audience are the ordinary tourists. It not only provides a wealth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constructs an image of the city through selecting, highlighting and arranging some urban landscapes. In modern Fuzhou, the city guide grew out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but its focus had turned away from creating the “refined pleasure” for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t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target audienc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tried to redefine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landscapes, thereby reshaping the image of Fuzhou. Through modern publishing mechanism it became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modern elite who ignited th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masses.

Key words: modern times; Fuzhou; travel guides; city image